

## 資 料

## 中国における清水安三の記録について（補）

金 丸 裕 一

もくじ

壹、戦前・戦時中の部

貳、戦後（1945～1999年）の部

参、2000年以降の部

肆、清水安三に言及した中国語論文目録（稿）……以上は、本誌第68巻第2号（2019年7月）に掲載。

## は し が き

清水安三に関する中国側の記録や記事について、筆者は既に本誌前号において初歩的なまとめを公表した。ただその際、2015年以降の素材については主として分量の関係から割愛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だが、最新の評価や報道内容について紹介すべきだという声もあったので、以下に2015年以降の資料についてまとめてみた。誤記や不備について、大方の御叱正を仰ぎたいと思う。

## 参、2000年以降の部（つづき）

(32) 「罕见鲁迅书法作品 现身拍场」(『北京晚报』2015年11月26日) 7面。

本报讯 在即将举办的北京匡时2015年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极为罕见的鲁迅书法作品将亮相。

鲁迅的这幅书法作品只有短短的4句16个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专家介绍，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都已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讲，鲁迅为日本友人清水安三书写的这4句16字小幅公之于世，实在是令人欣喜的。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据介绍，这幅作品大约创作于1931年前后，其灵感来自于有一次鲁迅与友人内山完造的谈话。当时，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们

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深有同感，或许也是这幅手书想要传达的精神。

这幅鲁迅的书法挂轴装在一个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③③「鲁迅惊世倡语书法现身」（『北京青年报』2015年11月27日）A19面。

本报讯（记者 王岩）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获悉，北京匡时2015秋拍将有一件鲁迅先生极为罕见的书法作品上拍，内容颇为耐人寻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上述连署名在内总共十八个毛笔字，书于24×20厘米的色纸之上，后装裱成日式条幅，并配有长形木盒，木盒盒盖内又书有如下毛笔字：“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此幅鲁迅书法作品甫一出现，立即吸引了鲁迅研究者的目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曾经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科学研究与教学。据陈教授介绍，“安三”即日本人清水安三，木盒盒盖内的这段话应出自他本人手笔，而“七十七”当为他77岁时所书。“添四个字”即“朝花夕拾”，鲁迅回忆性散文集的书名。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日式条幅上署名“鲁迅”的这16个毛笔字是他称之为“故人”的“周树人先生真笔”，这幅“真笔”是鲁迅书赠于他（清水安三）的。由此，又引出这位日本友人当年与鲁迅先生交往的佳话。1917年清水安三以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为榜样，由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派遣，以宣教师（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沈阳。1919年移居北京，进入大日本支那语同学会学习中文。1921年与夫人一起在北京创办“崇贞平民工读女学校”（后改名“崇贞学园”）。清水安三同情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参与日文《北京周报》的撰稿与约稿。正是在北京期间，他与日文《北京周报》的二位作者即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结识并开始交往。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也对此手迹的历史背景做了一番推测。他认为，这幅书法作品的创作年代应该在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见面交谈相当频繁。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的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此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鲁迅虽不信教，但对于信仰坚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怀敬佩，常致赞辞，无论其信仰的是什么教

派。他对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为他们日常笃信力行，不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无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五年级时读到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和尚的事迹，遂立志到中国传教，以回报鉴真和尚历尽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的恩德。他热爱中国，真心关切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尽力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苦难生活，不惧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抗争。他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的思想和文风。“清水安三喜欢鲁迅这一半抄录一半发挥的四句偈，请鲁迅书写，装裱珍藏，正在情理之中”。

③4 「鲁迅罕见书法作品下周亮相秋拍」（『北京日报』2015年11月27日）9面。

本报记者 陈涛／鲁迅不仅是大文豪，字也写得好。他亲笔手书的《致陶亢德信札》，全文不过二百余字，于2013年11月拍出655.5万元的天价，每字均价3万元，实实在在的“一字万金”。下周五，一件八十多年前的鲁迅罕见书法将登陆匡时秋拍“澄道——中国书法夜场”。据了解，该拍品来自鲁迅生前故人、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的后人，估价80万元。

这件书法尺幅仅为20×24（厘米），上有鲁迅先生手书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盛放挂轴的雅致小木盒，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附一段小字：“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考证，清水安三首次与鲁迅见面还颇有些戏剧性。清水安三晚年在《回忆鲁迅》一文里记录下这段趣事：“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对二人这段交往也做过研究。据他介绍，鲁迅人格中令清水安三印象最深的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写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劝说清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鲁迅批评日本人的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

黄乔生说，1931年是鲁迅和清水安三的密切交往期，推测这幅十六字书法应作于1931年前后，距今已有84年。书法作品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较为人们常见，也显得温和；而“放下佛经，立地杀人”显然系笔锋急转直下，难掩戾气。

鲁迅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十六字佛偈送给清水安三？黄乔生说，清水安三是基督徒，在与鲁迅过从甚密阶段，难免谈及信仰。他考证二人多份来往信函后有这样一番推论：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便据此写成《赠邬其山》（注：邬其山为内山完造的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在黄乔生看来，这首诗和寄给清水安三的四句佛偈有对应关系，“大概当时的政界高官们也是

假信佛，实际上很不仁慈的。一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就下野了，遁入佛门了。现在是下野了、信佛了、出洋了，可他们随时又可能放下佛经，再来当军阀杀人。”

至于“放下佛经，立地杀人”，陈子善认为是鲁迅在前两句基础上的自然引申，不仅可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对应，而且或有具体所指。“当时谁在大念佛经？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等联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鲁迅这四句16字会不会与此相关？如属实，讽刺意味就更明显了。”

(35) 「鲁迅手书上拍场一字千金谁来藏」（『新京报』2015年11月30日）C1面。

[前略]／四句偈语，或创作于1930年左右

此次上拍的鲁迅书法作品内容为四句偈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连署名在内共十八个毛笔字书于24×20cm的色纸之上，后装裱成日式条幅，并配有长型木盒（下图），盒盖内又书有如下毛笔字：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北京匡时书画部经理晏旭告诉记者，鲁迅曾在《准风月谈一归厚》中写过“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根据该文与此次书法的文句，鲁迅研究者推测此次上拍的内容书写年代大致在1927年-1931年之间。

他与清水君的首次见面，很戏剧性

随着这幅作品的现世，也将一段文化交往再度向世人呈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称，这幅“真笔”是鲁迅书赠予清水安三的。在清水安三的晚年回忆中曾提到，他与鲁迅的首次见面有点戏剧性。清水安三当时是去拜访周作人的，结果吃了闭门羹。“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这个人就是鲁迅。”

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中，清水安三是一个重要人物。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说他与鲁迅“交往甚密”。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1931年是两人一生中第二个密切交往期，日记中不断有“清水君来并赠水果一筐”“邀清水、增田二君饭”等记载。

他写过的东西，都会在日记中记录

陈子善表示，“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

缘何鲁迅书法流传至今已是为罕见？晏旭告诉记者，鲁迅的书法作品是国家不遗余力的珍藏对象，私人收藏领域有少数的鲁迅书信、信封等藏品，但很少有书法作品，“鲁迅心特别细，他书写过的东西都会在日记中有所记录，为此鲁迅博物馆成立后在鲁迅书法方面的收集下了极大工夫。”

与此同时，即将上拍的这件鲁迅书法也具有极深的寓意。晏旭告诉记者，鲁迅早年研究过大量的佛教，对佛教哲学内涵有很深的研究。而在这一书法作品中，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後略]

## (36) 「鲁迅赠友人书法亮相秋拍」（『北京晨报』2015年12月1日）C2面。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硕）近两年，名人信札收藏逐渐升温，其中鲁迅的书法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拍场并不多见。而在今年秋拍中，一幅鲁迅写给友人清水安三的四句16字作品将现身匡时2015秋拍“畅怀——历代书法夜场”。

此幅作品出自清水安三的后人，而清水安三是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说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并自认为是“最初向日本介绍鲁迅的”。

而此次上拍的作品为四句偈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推测，“此幅作品可能写于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见面交谈相当频繁。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此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黄乔生解释说，“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幅作品装在一个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尽管此幅作品一无上款，二无钤印，但是仍被业内专家认定为真迹。

据悉，此幅作品的估价为80万元。

## (37) 王琳「鲁迅手迹上拍 估价80万元」（『大连日报』2015年12月2日）A8面。

近两年，名人信札收藏逐渐升温，其中鲁迅的书法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拍场并不多见。而在今年秋拍中，一幅鲁迅写给友人清水安三的四句16字作品将现身。此幅作品出自清水安三的后人，而清水安三是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说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并自认为是“最初向日本介绍鲁迅的”。

而此次上拍的作品为四句偈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推测，“此幅作品可能写于1931年前后。”

值得一提的是，此幅作品装在一个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尽管此幅作品一无上款，二无钤印，但是仍被业内专家认定为真迹。

据悉，此幅作品的估价为80万元。



⑶ 「虽有“鲁迅风格”，仍存两大疑点」（『文汇报』2015年12月3日）9面。

本报记者 李婷／据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12月4日，在该公司2015秋拍“畅怀——历代书法夜场”中，将现身一件“鲁迅赠给日本友人清水安三的书法作品”。该立轴尺幅为24×20cm，上有鲁迅手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盛放立轴的小木盒的盒盖内侧有题识：“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附一段小字：“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无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该消息一出，引发学界的极大关注。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萧振鸣透露，鲁迅的手稿，因其文章风骨及人格魅力，蕴含了重要的价值。经过几十年的征集，保存下来的鲁迅手稿绝大多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等国家文化机构，散落民间的可谓凤毛麟角。鲁迅手稿真迹出现在拍场并不多见，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嘉德秋拍的一件鲁迅致陶亢德书信，200余字书信拍出655.5万元的天价，堪称近现代文人最贵的一纸手稿。此次匡时拍卖的这一件鲁迅的行书作品，虽然内容符合鲁迅的思想，文风也确是鲁迅的风格，但也有专家认为其创作背景、来源等方面存在疑点，有待更严谨的研究。

创作年代难以断定

萧振鸣告诉记者，他昨天在匡时秋拍的预展现场看过了这件拍品，既无上款，落款也无日期和铃印。这种情况在鲁迅所遗诗稿条幅中很少见，也使得它的创作年代很难断定。按照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书画部经理晏旭的说法，这件拍品大致创作于1927年至1931年之间。有专家认为，这种推测尚缺乏史实支撑。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1917年进入中国，在北京朝阳门外创立崇贞女子学园，也在日文版《北京周报》担任过记者。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清水安三结识了鲁迅。清水安三晚年在《回忆鲁迅》一文里记录下了首次与鲁迅见面的情景：“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王锡荣告诉记者，根据现存的鲁迅日记，清水安三的名字一共出现过3次。首次是1923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也来”。第二次是1923年8月1日：“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第三次是1924年5月7日：“下午清水安三君来，不值。”意思是清水安三去拜访鲁迅，但两个人没碰上。

根据萧振鸣考证，清水安三的确与鲁迅相识，但相互间的交往主要在1927年以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指出，鲁迅日记中出现过两位姓清水的日本人，一位是上世纪20年代跟鲁迅有过交往的教育家清水安三，另一位是上世纪30年代跟鲁迅交往过的地质学家清水三郎，不能混为一谈以证明鲁迅与清水安三交往密切。

拍品来源模糊不清

学界专家认为，这件拍品存在的另一个疑点是来源。“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手的资料证明鲁迅曾赠给日本友人清水安三这样一幅书法立轴。”萧振鸣指出，晚年，清水安三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1967年）、《回忆鲁迅》（1968年）、《怀念鲁迅》（1976年）等文追忆鲁迅，但这些文章中

都没有提到过鲁迅曾赠他这件行书立轴。

萧振鸣告诉记者，199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曾登载了一篇研究文章，文内提到鲁迅曾将十六字佛偈寄给清水安三，但那是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发现这张明信片的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饭田吉郎。据饭田吉郎回忆，他是在搜集、整理资料时“无意中”看到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杀人”写在明信片上，寄出人署名是鲁迅，收信人是“上海徐家汇 清水安三先生”。并说“是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的，无日期，邮戳也模糊不清。”在明信片的正面还有手书“应需回信”四字。

萧振鸣透露，对于饭田吉郎的文章，也曾有专家提出质疑，认为他没有提供照片，无法判断这是否是一张明信片，可能由于翻译的关系弄错了。萧振鸣认为，即便如此，也无法考证饭田吉郎发现的鲁迅手迹是这次上拍的拍品。因为，饭田吉郎所述鲁迅手迹上的佛偈后一句“放下佛教，立地杀人”，与这次上拍的挂轴上的“放下佛经，立地杀人”有出入。在立轴里，“佛教”被改成了“佛经”二字。

就该拍品的来源，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表示怕给藏家带来麻烦，不方便透露。该公司同时表示，此前对拍品做过鉴定，对其有信心。

(39) 「鲁迅书法作品逾300万元成交」(『江海晚报』2015年12月6日) A8面。

中新社北京12月5日电 4分钟，11轮，304.75万元人民币！5日凌晨，在北京匡时秋拍“澄道——中国书法夜场”中，一件罕见的鲁迅书法作品以75万元起拍，经激烈竞价，最终大幅溢价，成交价远超此前的估值80万元。

这件书法拍品尺幅仅为20×24（厘米），上有鲁迅先生手书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平均算下来，一个字约19万元。

鲁迅书法在民间极少流通，在收藏界可谓“凤毛麟角”。此前在2013年的嘉德秋拍中，鲁迅于1934年写给民国著名出版人、编辑家陶亢德的信函，拍出了655.5万元天价。

据透露，本次书法拍品源自周氏兄弟（鲁迅本名周树人）故人、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的后人。作品被盛放在一方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题识：“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附一段小字：“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此外，曾收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清宫内务府主管赫奕《烟树山亭》以2530万元成交，位列“古代绘画夜场”最高价。昨晚的北京匡时秋拍的古代与近现代书画夜场总成交额达5.4亿元。

(40) 「引人关注的鲁迅书法」(『团结报』2015年12月10日) 8面。

近有一件鲁迅的书法作品在北京匡时秋拍上拍，以75万元起拍，经11轮激烈竞价，最终以304.75万元成交，远超此前的估值80万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纵观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都是凤毛麟角。这件作品是鲁迅为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书写的四句16字小幅书法，此次公诸于世，令人欣喜。藏品来自清水安三的后人，为较为罕见的鲁迅书法。

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中，清水安三是一个重要人物。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

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说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并自认为是“最初向日本介绍鲁迅的”。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1917年作为天主教神甫被派到中国传教，1920年在北京朝阳门外创立崇贞女子学园，后曾在天桥附近创办救济院爱邻馆。他在北京期间，担任过日文《北京周报》记者，写了大量报道，把中国社会现状介绍给日本读者。他与鲁迅兄弟相识，曾到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访问。鲁迅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水安三来访的记载。清水安三1946年回日本，创立了樱美林学园，1988年去世。他为鲁迅手迹挂轴写题记是在1968年，时年77岁。

这件书法尺幅为20×24厘米，书法的内容为四句偈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作品被盛放在一方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题识：“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附一段小字：“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尽管这幅字既无上款、落款也无日期和铃印，经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考证，此书是周树人真笔。“安三”即日本人清水安三，“木盒盒盖内的这段话出自清水安三本人手笔，而七十七当为他77岁时所书”。陈教授认为，木盒内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我们，“署名鲁迅的这16个毛笔字是鲁迅书赠予清水安三的”。

按照清水安三晚年的回忆，他首次与鲁迅见面有点戏剧性。清水安三晚年在《回忆鲁迅》里记录这段趣事：“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这一次相见的时间，学界有1921年和1922年的不同说法。

鲁迅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手迹，但以对联、立轴、斗方、横批等形式出现的书法作品却很少，在民间更是极少流通，所以收藏界人士也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其珍稀度。

(41) 「真情写爱憎无心作书家」(『北京晚报』2015年12月10日) 40面。

[前略]／但也有专家提出质疑。根据现存的《鲁迅日记》，清水安三的名字一共出现过3次。首次是1923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也来”。第二次是1923年8月1日：“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第三次是1924年5月7日：“下午清水安三君来，不值。”意思是清水安三去拜访鲁迅，但两个人没碰上。另外，《鲁迅日记》中出现过两位姓清水的日本人，一位是上世纪20年代跟鲁迅有过交往的教育家清水安三，另一位是上世纪30年代跟鲁迅交往过的地质学家清水三郎，不能混为一谈。晚年的清水安三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1967年)、《回忆鲁迅》(1968年)、《怀念鲁迅》(1976年)等文追忆鲁迅，但这些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过鲁迅曾赠他这件行书立轴。／[後略]

(42) 王锡荣「再谈鲁迅偈语条幅」(『文汇报』2015年12月30日) 11面。

按照文物鉴定的规则，只要一处“不对”，那就是整件东西都“不对”了。而这件东西，“不对”的地方也未免太多了。

据报，12月4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以303万多拍出一件鲁迅手迹：佛教偈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落款是“鲁迅”(参见文末附图)。据拍卖公司图录说明，这个条幅是



放在一个小木盒里的，木盒面上有中文题款：“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此书是周树人先生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拍卖公司备注：“清水安三旧藏并题盒。”鲁迅研究专家陈子善和黄乔生都写了考证文章，分别考索了相关史实，也提出了一些存疑之处。但当然，之所以能拍到三百多万，买家还是看好的吧。但据我考察，这个条幅的难解之处和疑点越来越大。

首先是，饭田吉郎介绍的明信片 and 这个条幅究竟是什么关系？虽然饭田没有像日本人惯常做的那样提供图片，但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饭田吉郎说的不是事实。但是，他的说法里却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实在无法排除疑点：

第一，鲁迅在明信片正面写了“应需回信”四个字，那就是非常奇怪的事：这不是鲁迅会做的事啊！试想，鲁迅会在给别人的信或者明信片上这样写吗？这样要求别人回信，未免太不礼貌了。这种话，更多像是收信人自己的标注，以提醒自己别忘了写回信。黄乔生的考证也说是收信人的标注，但是饭田却是明明白白写着“在明信片的正面有鲁迅写的‘应需回信’字样”。饭田解释说：“看来很可能是应清水的请求而写的复信”，这同样令人起疑：鲁迅即使是应清水之请写回信，怎么可能把对自己的提醒写在给对方的明信片上呢？

其次，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清水与鲁迅的接触主要出现在1923-1924年，因而《鲁迅全集》编者把这个偈语时间定为1923年。但是，饭田的文章却说“当时中国正处于‘五卅’惨案和蒋介石反共‘苦迭打’的黑暗社会之中”，那么，这就不可能是1923-1924年的事了。但是，1927年后，清水在鲁迅日记上却并没有明确记载。现存鲁迅日记，在1927年后仍有“清水”的记载，但据注释，却是另一个清水：清水三郎，是一个地质学家，1931年时在上海日本人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经增田涉介绍认识鲁迅。在1931年5月到1935年11月间，鲁迅日记有关于他的记载达23次，远远多于清水安三。看来，说清水安三在1927-1931年间与鲁迅有第二个交往高峰，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过，据我所知，《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是以早年“鲁迅著作编刊社”的杨丽萍女士等人的调查为基础的，但并未经过两个清水本人的证实。所以，也不敢绝对说，那么多次记载“清水”，一次也不是清水安三。清水安三自己说，他也曾在上海见过鲁迅。但问题是，为什么鲁迅对此没有丝毫记载呢？

其三，饭田吉郎说，明信片写的收信人是“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这也是非常奇怪的。徐家汇是个地名，不是具体地址，甚至不是路名，就凭这个地址，是否能找到清水安三呢？他又不是什么大名人，况且他既然不是定居上海，就只是临时居住而已，而这写法好像只要到了徐家汇便人人知道他住在哪里一样。还有一层，如果确是1927年以后，鲁迅住在上海，写到本市的信，并不用再写上“上海市”，尤其是不用、也不会多写一个“市”字，要不就写“本市”。甚至即使是外地寄到上海的信，一般人都很少写这个“市”字，因为只写“上海”照样会寄到上海“市”。我们看鲁迅收信的很多信封上就是没有“市”字的。所以，身在上海的鲁迅给同样在上海的清水写信，而要在封面上写“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即使属实，也实在是非常奇怪的。

其四，“明信片”一词，在日语里应为“叶书”，而饭田却写的是“页书”，这也是非常奇怪的。

其五，正如大家所质疑的，按照饭田记载，鲁迅写的后两句是“放下佛教，立地杀人”，这也是奇怪的。虽然从意涵上说，放下佛教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从文字上说，却是不通的，尤其是对于作为太炎弟子，特别讲究文辞工稳的鲁迅来说，多少显得有点业余了。从平仄的角度看，前两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中原韵），后两句却是“仄仄仄仄，仄仄平平”，如果把“佛教”换成

“佛经”就合乎平仄了。如果东西不假，那在音韵上也是一个小瑕疵。

光是饭田写于1996年的介绍文字，就有这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看来《鲁迅全集》收入这件东西是有点风险的。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件东西本身，疑点更大：

其一，这个条幅，拍卖说明是“日式条幅”，其实这个条幅跟日式条幅有明显区别。日式条幅一般上端都有两根垂带，而这个条幅却没有；

其次，这个条幅装裱极差，表面很不平服，这种皱褶，完全不像日式装裱的精致平服。倘若说是保存不佳所造成，则又与收藏盒的考究相矛盾。

其三，收藏盒上的题款更出问题。首先，清水有必要用纯中文来写吗？作为日本人，清水的中文似乎并不好。现在我们假定他是个中国通，中文好得不得了，可是，须知他毕竟是日本人，他为自己精心收藏的鲁迅书法做收藏盒，居然用中文来写说明，未免太奇怪：难道他不准备给儿孙看，倒是准备给中国人看的吗？他知道这件东西将来要卖给中国人的吗？

其四，这里的题款更加要命：首先，他收藏也就收藏了，写个说明也应该，可是干嘛要在这里提什么“朝花夕拾”？如果是当年鲁迅写给他的字，又怎么能说是“朝花夕拾”呢？何况，不值钱的东西才是“拾”，珍贵的东西怎么说“拾”呢？“拾”又好像是无意中得来，又怎么符合他的身份？其实，“朝花夕拾”含有自谦的成分，早上的花，到了傍晚已经枯萎了，然后自己来拾掇收藏，有“敝帚自珍”的味道，清水的中文既然熟练到了连自己收藏品的题款都习惯用中文的地步，又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这是一；还有，后面那几句更糟糕。“安三七十七”，题款有这样题的吗？居然只写数字不写年纪，这到底是日语还是中文？倘说是“日式”中文，日语真是这样的吗？再次，后面的“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更让人失笑。首先，中文完全不通，跟一个连自己的藏品盒都习惯用中文书写的人，完全不匹配；“此书”，就是个笑话。这不是“书”。而是“书法”！“周树人”三字写法更出问题：他居然把“树人”二字缩小靠边写！把名字缩小靠边写，这是什么情况？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一种，自谦。在给别人书信或文本中自称，名字缩小以示谦卑；其次，在一些公文里，并列提及名字时用，通常用来表示轻视、忽略之意。而清水居然在这样一个极为珍贵的收藏盒题款中提到鲁迅而把鲁迅名字缩小靠边写，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还有，这题款似乎有点文言的意思，但却用了现代白话文的语法：接连用了两个“是……也”，前句只要说“此周树人先生真笔也”就可以了，却画蛇添足，弄得好像他也跟三十年代中国文人一样半文不白了；后面又来“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也是不但不通，而且不合理，前面已经提到周树人了，马上又来说“鲁迅先生”；其实，“思慕故人不尽”，也是问题，故人早已“故”去，如何能用“思慕”？“添四个字在此”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又完全是现代汉语。说实在的，清水的中文如果不好，他既不会用中文题写，也不会写成这样！如果好，当然就更不会这样写。

其五，饭田说他见到的明信片写于“五卅”和“蒋介石”时期，则必然是1927年以后，但是，鲁迅有必要在写了一个明信片后，再依样画葫芦自己重新写一个同样内容的条幅吗？迄今所见清水记述与鲁迅的关系，从未提及有这个条幅，如果清水在收到明信片后又请鲁迅重写条幅，这样曲折的过程，他会在多次回忆中一点也不提吗？

其六，再看这个条幅的文字。初看之下，似乎有鲁迅之风，虽然显得松散潦草，还有涂改，但总体上看似乎还是鲁迅的字。虽然肖振鸣先生指出这书法有很多可疑之处，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当时状态不佳，手下力亏，所以下笔散乱，不似当时他的一般毛笔字。但问题是，前面全都

松散，到落款“鲁迅”二字却又显得精神起来，这就不合理了。

最后，据陈漱渝先生告知，他问了清水的后人，对方却说不知道有这条幅。诚然，后代不知前代事，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这是清水先生77岁也就是1968年写的，他那么大年龄，又那么珍爱，又怎么居然让这东西出了手，后人居然一无所知？这却是十分奇怪的。

按照文物鉴定的规则，只要一处“不对”，那就是整件东西都“不对”了。而这件东西，“不对”的地方也未免太多了。

编者附识：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首席专家，相关新闻可参见2015年12月3日文汇报文化版《虽有“鲁迅风格”，仍存两大疑点》。

(43) 「鲁迅致清水安三行书偈语是真品吗？」（『中华读书报』2016年1月13日）1面。

鲁迅手稿，因其文章风骨及人格魅力，蕴含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多年来为藏家所重，现均为国家一级文物。经过几十年的征集，现分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散落民间的如凤毛麟角。近年来，各拍卖会拍卖鲁迅手稿时有出现，但假多真少。2015年12月4日在匡时2015秋拍“畅怀——历代书法夜场”中，现身一件由鲁迅的日本友人清水安三收藏的鲁迅书法作品。虽有专家论证，但笔者认为疑点颇多。

(44) 「“七七事变”时清水安三的请愿游说」（『团结报』2017年7月13日）5面。

“七七事变”时期，在北平创办崇贞学园的日本民间人士清水安三，为了避免北平古城在战火中遭到毁灭，曾多方奔走游说请愿，这件事迄今还鲜为人知。

日本在中国的驻军，是根据1901年清朝政府与英、俄、日、德、美、法、意、奥、比、西、荷11国公使签订的《辛丑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派驻的，名称先后使用过“清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天津驻屯军”等，卢沟桥事变时，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日本租界。本文采用国内习惯称呼，通称为“华北驻屯军”。

1937年7月7日晚，驻扎在卢沟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军事演习，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驻守宛平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第三营拒绝，双方遂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日军向宛平城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进行还击，由此演成中日全面战争序幕的“卢沟桥事变”。

关于“卢沟桥事变”时期，目前史学界还没有明确界定，本文将这一时期界定为1937年7月7日中日两国军队在宛平城发生冲突，至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期间。卢沟桥事变时期，在北平创办崇贞学园的日本民间人士清水安三，为了避免北平古城在战火中遭到毁灭，曾多方奔走游说，以个人力量进行了一次请愿活动。

卢沟桥事变的第一天

清水安三在记录他北平生活的《朝阳门外》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记述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一天的经历和感受，标题为《七月七日的当天》。

众所周知，华北驻屯军在卢沟桥的演习是在7月7日晚上举行的，名称即是“夜间演习”。根据日本北平特务机关历史档案编辑的《北平陆军机关业务日志》中记载到：“接小野口旅团副官电

话：丰台部队第八中队报告，在卢沟桥龙王庙附近夜间演习中，午后十一时左右突然遭到中国一侧十八发炮弹的射击。”这条电话记录，是日本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最原始材料，尽管目前在那天谁开第一枪、第一枪是为什么开的还有分歧，但这个电话记录已经明确指出时间是深夜11时左右，当消息传到北平，已是7月8日的凌晨。

清水安三得到卢沟桥事变消息，是7月8日上午10时左右。当时，他像往常一样正在崇贞学园给学生讲课，一位叫息实的人匆匆跑回来说：“朝阳门关闭了，昨天晚上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了。”清水安三说息实是“返回”说这番话的，说明息实离开崇贞学园不久，他也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

听了息实报告的消息，清水安三心头一紧，想：“大战就要爆发了，二三年前我就预言过中日之间会有一战，这一天还是来了。”课堂上的学生也听到了息实的话，一个女生紧张的脸都发白了。看到这种情况，清水安三觉得在这种场合作为教师和校长首先应该保持沉着，于是只是镇静地说“这样啊”，便继续讲课。

想必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听到卢沟桥交火的事了，人心十分浮动。下课钟声敲响后，清水安三把全校学生召集到操场，让大家不要害怕，自己会给日本大使馆（清朝时期设立的日本驻中国公使馆，位于北京）打电话了解真相。可是，电话打过去一直没人接，知情者说大使馆的人都逃到通州去了。通州在北平城东20余公里，1935年12月日本扶植的殷汝耕等人在那里成立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时被日本人认为是安全的地方。这证明事情的确很严重。回到操场，学生们议论纷纷，声音虽然很低，但情绪明显受到刺激。课是不可能再上了，大家都急着回家。清水安三叮嘱大家不要单独行动，要三五人结队一起出去。学生们刚刚走出学校，就传来隆隆炮声，这是清水安三在回忆卢沟桥事变时第一次提到的炮声，大家立刻意识到战火切切实实在身边发生了。炮声逼着家住得近的学生加紧了脚步，动作慢的学生不敢再走，急忙返回学校，有的忍不住哭泣起来。

因朝阳门关闭，十几个住在城里的学生回不了家。那时，中国大多数家庭习惯一天吃两顿饭，崇贞学园也遵循这个习惯。10时左右，正是吃第一顿饭的时候，清水安三怕学生饿肚子，自掏腰包开始让校工出去买馒头，让学生去校园菜地摘了些黄瓜，拌上醋，当下饭菜。可是，馒头买回来了，开始大家忐忑不安，谁也吃不下去。清水安三勉强笑着说：这馒头怎么不像长在头上的，像是长在脚上的脚踝啊。馒头一般是圆形的，这次可能买的是长形的，北平人叫山东馒头，所以清水安三开这样的玩笑。他这样说，是想冲淡些紧张气氛，让学生们放松一下。果然，有些人笑了，于是开始吃起馒头。起初还是一个一个地吃，后来有的人吃了二个还不够，吃了三个。

清水安三用细致的文笔记录了打不通位于北京的日本大使馆电话、一位女生脸发白、大家吃不下馒头等细节，形象地刻画出人们在突然刺激下的紧张、恐惧、不知所措，它让后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卢沟桥事变在人们心里的强烈撞击。同时，在前途未知、人人心神不定面前，清水安三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尽力稳定学生情绪，让大家从紧张气氛中摆脱出来。

这年，清水安三46岁，待人处事已有很好修炼。崇贞学园是所女子初级中学，招收的都是初中学生。作为一校之长，动荡时刻的第一要务是照料好尚未成熟的求学少年。就在大家焦急不安的时候，一个回到城外家里的学生打来电话，说东直门开着半边门。北平是座古城，从里到外建有皇城、内城、外城三层城墙，其中内城有九座城门，东侧为朝阳门、东直门。这两座城门距离不算远，也不算近，清水安三的家也在城里，位置大约在东华门至沙滩一带，于是决定马上和学生去东直门。说走就走，走慢了说不定东直门也会关闭。学校门前有不少准备回城里的洋车，清水安三叫了六辆，



自己骑着自行车夹在中间，他们和其他进城的洋车，排成一列长长的车队，朝着东直门方向开去。

途中，遇到街上的中国人，他们看见车队过来，就冲车上的人指指点点，说：“日本人、日本人。”清水安三他们听了默不作声。行人的态度不难理解。可以想象，战端即开，中日已成敌对国，百姓看见日本人，自然视为敌国之人。清水安三平时总穿着和服，只有为了办事方便或者需要回避身份时，才换上中式衣裳。崇贞学园的学生，一半也是日本子弟，穿戴也是日本服铜牌饰。这天，他们肯定还穿着日式服装，所以引来那么多目光。

到了东直门，清水安三长喘一口气，总算进城了，厚厚的城墙给了他和学生们安全感。回到家，妻子还没回来，只有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清水畏三。畏三正在修理他的自行车，是啊，这个时候自行车比人走得快，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清水安三对畏三说：“今天被好多事耽搁了，连饭也没吃成。”畏三听了并不吃惊，反而说：“爸爸，这是战争啊！”这话让清水安三冷静下来，他喃喃道：“是啊，是啊，这是战争。二三年前，我就预言日本和中国会有一场战争，只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就来了。”

远处不时传来炮声，清水安三在炮声中把给学生买的馒头当午饭。清水安三回忆中特别说他这顿饭吃的是馒头，似乎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他还保持着以大米为主的日本饮食习惯，馒头还不是基本口食。其二，卖食物的店都关门了，街上已经买不到他们平日吃的食物了。

吃过馒头，清水安三本想骑自行车去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问问那里的人都逃到哪里去了。这时妻子回来了，她说：别出去了，出去也找不到洋车，找到了车夫也不肯拉，我都跟他们吵起来了。听了这话，清水安三决定哪儿也不去了。衣服也没脱，就上床睡午觉了。

晚上，日本居留民会打来电话，说要召集商谈会讨论避难问题，因为清水安三是第六区组长，所以要他参加。日本居留民会是旅华日侨的一种自治性民众团体，在日本侨民居住较多的地方，都设有此类团体。清水安三参加了这个商谈会，会上讨论的都是预防不测的措施，如购买两千包贮藏大米、白天家门口挂日本旗子，遇到紧急情况夜晚放焰火信号，以及到日本大使馆避难等。这次商谈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给东京发封请愿电报，内容主要是要求日本出兵。清水安三不赞成电报的内容，他婉转表达了他的反对态度。

那天晚上，住在清水安三家附近的一个日本人接到一位日本女性电话，通知说如果看见点起三个焰火，就马上带一条毛巾和一件行李去大使馆避难。这说明他区的日本居留民会，也在当天晚上召开了类似会议。这个电话表明日本军队是铁了心打进北平，日本大使馆才逐一给各家打了这个电话。

上面的记述，主要根据清水安三的《朝阳门外》一书，记录了7月8日清水安三的亲历和见闻，让我们现场般地了解到一个普通在华日本人士的多元处境。在中国，记录中国人在卢沟桥事变第一天所见所闻的文章不胜枚举，而记录日本人这天的反应却还罕见。清水安三的实录，尤其是一些看似平淡的细微情节，生动地告诉我们卢沟桥战火给近在咫尺的生活在北平的人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伤害。

(45) 「“七七事变”时清水安三的请愿游说」(『团结报』2017年7月20日) 5面。

卢沟桥事变爆发初期，许多人以为这次事件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间在华北不断出现的冲突一样，也可以通过交涉和谈判得到缓解。卢沟桥交火后不久，现场对峙部队也暂时达成了临时停



火协定。但由于日本驻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将这一事件视作天赐良机，准备借机打垮国民政府、占领整个华北，才由局部冲突演变成一场长达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

清水安三最初也没有把卢沟桥冲突看得那么严重，所以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在《朝阳门外》中，他说每天都听得见从西郊、南郊传来的大炮轰鸣声，但自己的生活与平常没有变化，7月16日还和一个住在他家里的东京年轻人一起逛大街。事变期间，北平上演了两个新编话剧，一是北平剧团演出《阿Q正传》，一是沙龙剧团演出的《日出》。《阿Q正传》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清水安三曾经拜见过鲁迅，写过介绍鲁迅的文章，也读过《阿Q正传》这部小说，所以特意带着东京年轻人一同到小剧场观赏了这个话剧。

清水安三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情，与北平沦陷前出现过一段表面上相对平静的形势分不开。卢沟桥交火后，北平形势风谲云诡、跌宕起伏。驻守北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与华北驻屯军之间是打打停停，双方既不肯退步，也不放弃交涉谈判。

从日本方面说，东京在国防政策上存在“先北后南”和“北守南进”两种意见，前一种意见在处理卢沟桥事变问题上，主张“不扩大”。至于日本军队方面，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因心脏病已奄奄一息，其职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暂时代理。7月11日，日本天皇亲自决定香月清司中将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虽于当天就从日本飞抵天津，但他到中国之前，华北驻屯军在战和大事上缺少拍板做主之人，故需要维持现状。此外，兵力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当时在北平前线的日军只有步兵两个大队，天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连日阴雨困在通州，即使开战，也缺少兵源。

从中国方面说，统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是凭借二十九军为后盾武力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二十九军是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结成同盟，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进行混战失败后的残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是其唯一地盘，放弃北平、天津等于丧失维持部队的经济来源，再无立足之地，所以不愿意战火扩大。另外，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还在山东乐陵老家为父亲修墓，他是得知战事发生后才动身返回的，在经过天津时还与香月清司相约停战一个星期。

7月8日，演习中“失踪”的日本士兵已经归队，证明卢沟桥冲突完全没有理由。下午，华北驻屯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中佐与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少佐，前往代理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进行交涉。经过唇枪舌剑，最终在9日凌晨达成双方军队各自撤回原驻地，宛平城由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的保安队维护治安的临时协议。

石友三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重要将领，1924年任国民军第六军军长，故与西北军残部二十九军的许多人相熟。石友三1932年便与土肥原贤二接洽，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当时，他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10日，今井武夫接到东京的“应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不扩大事态，通过现地交涉迅速解决”的训令，为了执行这一训令，今井武夫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相商，决定与北平当局举行谈判。谈判中，松井太久郎与今井武夫提出“卢沟桥及其附近地方之中国军队即时撤退”“中国方面道歉并处罚责任者”“实行防共取缔排日”等条件。北平当局为了早日平息事态，接受了这些要求。事后，日方发表消息，称“业已签订（停战）协定”。12日，二十九军从卢沟桥撤出，北平至天津间的铁路交通也于同日恢复。这样，在中日互相摸底、保持交涉的形势下，北平出现了一段

时期的缓和，清水安三才能有兴致逛大街、看话剧。

但是，轻松的日子没有多久，因为表面缓和的背后，则是加紧备战。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决定从国内调动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有力部队到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接着下达了停止交涉、已达成协定全部撕毁的命令。这个内阁决定是秘密的，故外务省当天的声明中仍称华北事件应现地解决，北平表面上仍维持原状。13日，日本内阁全体阁员一齐出动，要求各界拥护政府的对华政策。14日，日军到达天津的兵车已达16列，1500人向丰台进发。18日，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丰台设立司令部，战火蔓延的趋势已路人皆知。

北平局势再度紧张出现在7月24日。这天，一直未放弃停战努力的宋哲元，发现他的忍让不但没有使事态平息，形势反而越来越险恶。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熊斌这时来到北平，对宋哲元说：据可靠情报，日本机械化部队正在加紧开进华北，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这番话引起宋哲元的警觉，促使他改变求和立场，开始着手应战准备。24日这天，宋哲元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商议作战计划，25日下令中止与华北驻屯军的谈判交涉，同时调配部队、增加北平城防。

华北驻屯军看到宋哲元态度开始转变，便展开强势压迫。25日，日本军队在飞机、装甲车配合下，占领了北平与天津间的交通要道廊坊，切断这两座城市的联系。继之，又于26日下午7时派兵驾驶26辆卡车，冲击北平城西南的广安门。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的接连出现，表明表面上的缓和已经结束，北平时局开始恶化，清水安三也意识到中日大战已在所难免了。

1919年3月以来，清水安三在北平已生活了18年，与这座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古都建立了深厚感情，说起这里的古代建筑、历史遗迹，都能如数家珍。因此，他很自然地想：一旦大战开始，北平必然遭殃，古城不应毁灭。带着这种朴素想法，他在许多场合陈说保护北平历史文物的重要性。清水安三有一篇通讯，写到自己的努力时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为了不使北京沦为战场，不让天坛和故宫受到损坏，我穿梭于日本与中国的要人、军阀及学者之间，极力去说服他们。给他们讲述的历史事包括与敌方合作保存了克里姆林宫的拿破仑，面对盘踞在日光的幕府势力，告诉他们不在日光决战的西乡隆盛，等等，我希望用这样的史实，劝告双方无论如何都不要把北京这一世界第一古都废为灰烬。为此，我费尽了唇舌。”其中所说的游说，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华北驻屯军占领廊坊、冲击广安门之后的事。

稍有文化的人，都了解北平城的价值，但用什么方法让古城免遭厄运才是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游说中，清水安三听到不少议论，其中把战场转移到古城之外的意见，引起他的注意，并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清水安三产生了一个念头：说服冲突双方不要在北平城内作战，把战场挪到永定河以南。

这个念头真是太天真了，一个日本政军界体制外的普通侨民，要说服敌对双方转移战场，岂非太不切实际了。不过，清水安三也有自己的优势。18年来，他从事的新闻工作、慈善事业、文化教育，以及与基督教各教会的关系，使他与在北平的日本各界建立了不少人脉，有些要员子弟还在崇贞学园读书，他们的父母和清水安三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那时，清水安三已将妻子郁子和次子畏三送上去旅顺的火车，他没有牵挂，可以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46) 「“七七事变”时清水安三的请愿游说」（『团结报』2017年8月3日）5面。

但是，清水安三的动作太迟了，当请愿书的文本工作全部完成时，宋哲元已没有机会看到请愿

书了。

7月27日凌晨2点左右，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清水安三从睡梦中叫醒。他被告知当天中午12点以前，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人都必须到日本大使馆避难，因为日本军队对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撤离北平，期限是28日中午12点。清水安三不会想到，在他游说期间，大批日军正在向北平、天津集结。到7月16日晚，除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外，关东军十一独立混成旅团、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陆军第五师团，以及第二飞行集团的120架飞机，已到达指定位置，总兵力达6万余人。日本援兵完成集结和部署，便于7月26日占领廊坊，切断北平、天津间联系，并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即27日）撤退西苑驻兵，48小时内北平城带来极大动荡。地处郊外的清华大学，由于邻近西苑，许多教授都是27日离开学校搬进城里，认为城内有军队守卫，总比城外安全。清华教授的决定是及时的，因为日本军队不但没有等候中国方面答复，而且行动也提前了。27日，日本军队攻占北京东面的通州等地，又切断北京南边的南苑与北平的联系。

7月28日，日本军队向守卫北平的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清水安三在回忆中记录这天的情形时说：“28日早晨，天还没有亮，炮声就越来越响，炸弹震的窗户玻璃不停摇晃。避难的下限时间正午就要到了，还见男男女女的日本人不管不顾地向日本大使馆跑去。”这是清水安三见到的，而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见到的就不一样了。朱自清是27日从清华园搬到城里朋友家的，28日是他进城后的第一天。两年后，这一天的情形还深深留在他的脑海里。朱自清说：“二十八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炸西苑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车道，可是这当儿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的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

午后，炮声又在很近的地方响起，这次大炮的音响有些不同，听得出是重型大炮。清水安三一下子愣住了，这分明是日本军队开始攻击了，因为二十九军没有这种炮。清水安三坐立不安，突然电话铃响了，是佩达斯打来的，他问清水安三：“你还想拜访刘牧师吗？”这个电话来得太及时了，清水安三正急着要见刘牧师呢，刘牧师曾答应把请愿书转给宋哲元。

街上机关枪声“啪啪”响个不停，清水安三换上中式服装，骑自行车，急不可耐地去拜访刘牧师。这个紧急时候，宋哲元已经没有工夫见人了，他正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和北平高级官员们商讨应付战局的对策。这个会议开了一下午，宋哲元根本抽不出身，清水安三能做到的，只是请刘牧师给宋哲元打了个电话，口述了不能把150万生灵和古都北平作为战场的理由。从清水安三记录这件事的文字看，接电话的应该是宋哲元本人，宋哲元在军情紧急关头接这个电话，不过是出于对刘牧师的礼节。

宋哲元没有工夫理睬清水安三的请愿，事态到了这般地步，请愿书已没有任何意义。在日本陆军协同作战下，幻想以妥协求和平的宋哲元，因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兵力配置分散，各部队作战目标不明确。随后二十九军战败，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

28日晚，接到刘牧师电话后的宋哲元，在北平随时可能被攻破形势下，派代表通知华北驻屯军：中国军队拟于28日晚9时，开始从北平城内撤军。晚9时，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将来，宋哲元带着秦德纯等部属，乘车出西直门，至长辛店改乘火车，撤往保定。驻守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一

三二师，也陆续向北平西面的门头沟方向撤退。

29日，是北平刻骨铭心的一天，北平被日军占领了。清水安三回忆这天时写到：“早上起来，我惊奇地发现昨天在街上还能看到的士兵和巡警，竟然一个也没有了，宋哲元率领着他的七千名士兵撤离了北京城”。

可想而知，撤离北平的中国军队情绪多么沮丧，但留在北平的中国百姓更是伤心万分。朱自清29日一大早就接到一个朋友电话，电话里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电话里还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儿，可是说得太热闹些”。末了，朋友说了北平中国人皆有的忧愁：“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在战端开始一周的时候痛感“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战争破坏，玉石俱焚”。吴宓不甘心做亡国奴，说：若真到那天，“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如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

26日华北驻屯军的最后通牒，正是松井太久郎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名义，在下午4时左右送到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宋哲元知道来意非常气愤，称病不见，并命秦德纯退回通牒，同时提出口头抗议。松井太久郎不甘心，威胁道：“条件接受当做，不接受也当如此做。”

对于清水安三这次请愿活动，迄今除了清水安三创办之崇贞学园的后身日本樱美林大学外，史学界还无人涉足。对于清水安三来说，这次请愿只是他的一次个人行为，但就中日关系史而言，则是日本在华民间人士希望保护中华历史文化的一次尝试。

卢沟桥事变三年后，德国军队进攻法国首都巴黎。1940年6月22日，节节败退的法国被迫接受十分苛刻的条件，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总理贝当解释投降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保存法国特别是保存巴黎这座城市。1949年年初，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下，决定放下武器，双方签订《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宣布和平起义。傅作义的起义的原因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是让北平人民和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火。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成为京都、奈良免遭轰炸的建议，虽然不是转移战场，但在保护历史文明这一点上，与清水安三的请愿也是一致的。1944年春，梁思成受命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目的是美国空军轰炸日本占领区时避开这些地方。据说梁思成在绘制中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关于梁思成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事，最早是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宿白先生访问日本时透露的，立刻引起日本的注意，一些学者还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梁思成的助手、当年协助梁思成赴重庆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的罗哲文先生做了明确肯定。梁思成后来的妻子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也说梁思成在世时对她讲过此事。此事因梁思成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故一直没有最后结论。这件事虽未完全证实，但的确出现在奈良上空的美军轰炸机，没有投掷炸弹就飞走了，因此奈良市民宁可信其有，还宣布在2010年10月31日庆祝平城建都1300周年时举办梁思成铜像的揭幕典礼。清水安三和梁思成一样，对包括交战国在内的历史文物一视同仁地主张加以保护。。

清水安三的请愿书表面上要求双方把交战地点转移到城外，实际上日本军队还在城外，城内本来就是中国军队守卫，要求双方转移交战地点，等于要求中国军队离开北平城。所以清水安三的请愿，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这一点毫无疑问。

（了）

